

制约我国内需增长的结构性因素的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赵坚毅杨瑞龙

一、我国内需增长动力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加速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需求是拉动一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但是，分析 2000 年以来，在我国总需求构成的动态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净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消费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如图 1—1 所示）¹。虽然如此，投资扩张带来的总供给的持续增加和净出口的持续增加，在外部需求良好的大背景下，依然使我国的总体经济保持了年均 10% 的超高速增长（如图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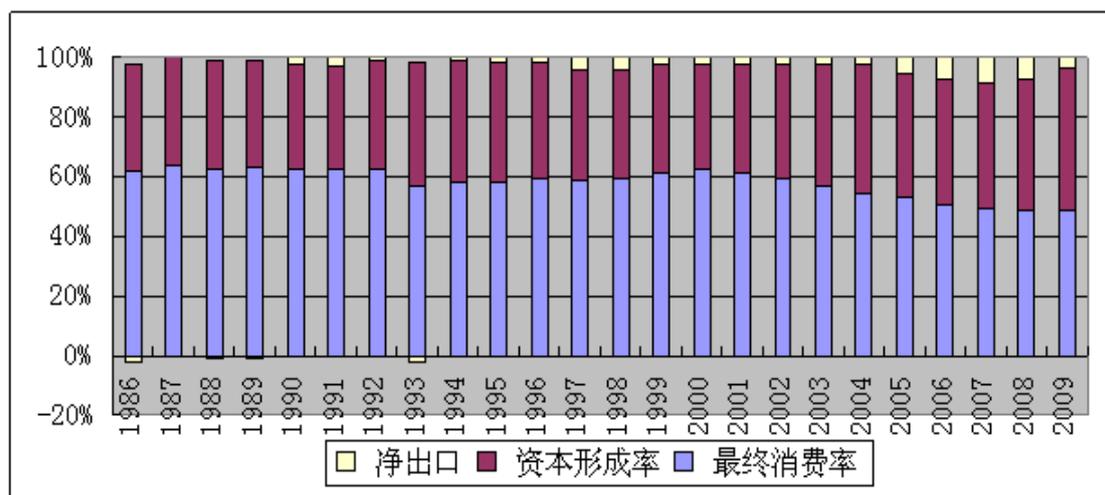


图 1—1 支出法 GDP 构成——中国

¹本图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摘要 2010》相关数据整理。图 1-1、1-2 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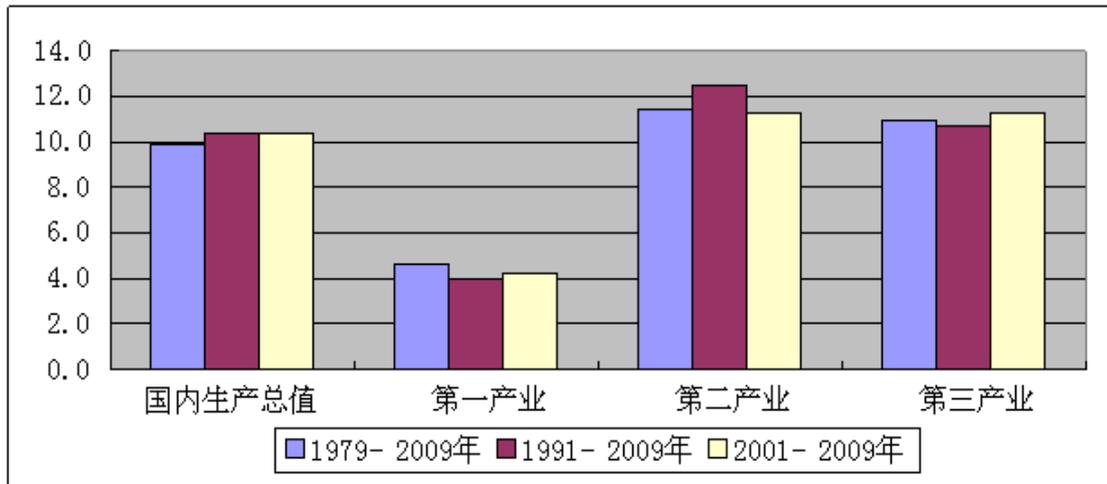


图 1—2 我国每年平均增长率

然而，在这种由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高增长的背后，其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广泛质疑，并且这种过分倚赖投资和出口的畸形的总需求构成，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失衡压力，特别是 2004 年以后我国所面临的不断加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外汇资产损失、宏观经济调控难度以及更深层次的环境、资源和社会压力。2007 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并最终演变成全球系统性金融动荡，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环境急剧恶化。在此影响下，我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并导致我国经济总体增速的大幅下降。无论是 2007 年以前的宏观经济失衡压力，还是 2007 年以后外需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都凸显了我国失衡的总需求构成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通过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方式则普遍被学界认为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通过扩张性的投资拉动内需，已被历史证明不具有可持续性。1923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投资拉动国内需求，在外部环境恶化的经济背景下维持经济增长。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爆发的滞胀危机充分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政府通过由投资导向的扩张经济政策转向消费导向的刺激国内消费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次，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不可控制，不是可靠的经济增长方式。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争端和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在目前各国经济普遍元气大伤的背景下，为了使本国经济尽快走出低谷，贸易保护主义在各国都有抬头的迹象。在这种外需不足情况

下，由外需（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下滑趋势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及时果断的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对于熨平经济波动和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需的拉动作用增强，外需的依赖程度下降。一方面，通过政府投资拉动内需增长，四万亿政府投资政策的出台，从直接受益产业来看，将对第二产业中的上游制造业产生直接的刺激作用，主要是钢铁、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从投资内容来看，四万亿元投资将集中安排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和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生态环境工程、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六个大的方面；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推进增加居民收入的相关措施的施行，确保最终消费在 GDP 构成中的比重稳步上升：通过提高收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通过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带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上升。

但是应当注意到，简单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中刺激内需、缓解外需减少带来的宏观经济压力，但是不足以实现内需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受制于很多深层次的制度和结构性问题，例如收入分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缺陷、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性服务供给的不足。由此，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需求的刺激作用，主要是通过投资需求的增长实现的。这在短期中可以实现国内总需求的增长，缓解外需下降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压力。在长期中，国内投资扩张带动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张，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能实现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和平衡对外需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增加。这将加剧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的状况，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在面对对外需冲击时的脆弱性进一步增加。

所以，简单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实现我国内需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进而无法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稳定构建可持续的总需求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我国内需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制约我国内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因素，特别是对制约国内消费需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展开分析。

二、制约我国当前内需增长的因素探讨

2.1 收入分配与消费

2.1.1 居民绝对收入的提高与相对差距扩大

近年来，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由 2000 年的 2253 元提高到了 2010 年的 5919 元，相比之下，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由 2000 年的 6280 元上升至 2010 年的 19109 元，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在居民绝对收入提高的同时，我国的基尼系数也有较大的提高，陈宗胜的统计及计算结果表明，2000 年全国总体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458，这表明我国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已进入绝对不平均的区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标准，并有继续扩大和加速的趋势。

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政府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如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不合理的差距，但各种差距仍然没有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

2.1.2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需求降低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政策适应了我国国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各种其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 2008 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导致分配改革环境不断恶化，各种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原有的平衡。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力度逐渐加强，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直较大，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除大量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之外，各种生活用品的价格也持续走高。就业与收入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使得很多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减缓，居民消费面临内部的约束，加之经济过冷，居民消费信心也陷入极度失落之中。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许多投资者悲观情绪继续蔓延，导致许多新项目计划的总投资大幅降低，因得不到有力的资金支持而不得已停滞不前或中断。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着我国生产力发展和投资增长；社会保障资金的拖欠、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发放的不足和延时等问题，使我国经济运行和分配改革面临艰难局面。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

2.2 社会保障体系与消费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功能是要保证社会各阶层的个人在退休之后都能享受到某种比较一致的利益结果，因此，适度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社会差异，并保证居民个人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各个阶段都具有较稳定的消费水平，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消费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增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乐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个人为实现跨期消费所要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如此，居民个人便会倾向于减少自己的预防性储蓄，被代替下来的储蓄应用于个人消费，从而增加了即期整体的消费。

然而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自愿性储蓄还是依然存在的，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度总体上来说还是增加了，从而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和倾向。正如福利经济学庇古所认为的，一元钱对于穷人和富人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相对来说，穷人的边际效用要更高一些，而富人的边际效用则相对较低。这样，实行具有收入均等化效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低收入者未来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能力，有助于全社会消费总量的提高。因此，从上述两个角度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的影响是积极的。

尽管如此，社会保障制度也有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可能使居民选择较短的工作时间和更长的退休期，与之相伴的是积累社保资金的工作年份的相应减少，这就使得居民在退休前减少消费，以保证退休后有稳定且比较宽裕的生活来源；有遗赠动机的消费者会增加储蓄以提高给子女的遗赠。因此，社会保障的退休效应和遗赠效应会对个人消费产生负面的影响。综上所述可以知道，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作用和程度是存在很大的弹性的。

2.3 金融体系与居民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生产力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居民家庭资产也经历了由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所拥有的金融与实物资产均达到空前的规模，成为国民经济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必然会受到居民金融资产发展的影响，居民个人资产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总体来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不断涌现，在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和居民资产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 1979 年以前的单一模式。单一模式的特点是，居民家庭或个人的资产主要来源于家庭或个人的劳动报酬，另外很少的一部分来源于存款利息收入。这两种途径下居民个人可支配资金的总量是有限的，而且不能实现跨期的消费。这些有限的资产又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各种生活消费，另一部分结余则用来进行储蓄。这种单一模式的金融关系，极大的限制了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降低了经济活力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第二种模式是 1978 年以后的多元化模式。该种模式下，居民收入多元化、投资多元化，同时消费也多元化。居民个人资金的获得已经不单单是劳动报酬和存款利息，而是以工资、奖金为主体模式，通过投资理财收入，诸如股票投资收入、储蓄存款收入、债券投资收入、基金投资收入、住宅房屋等不动产投资收入等收入的多种模式来获得更多的个人资产。这种模式适应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具有极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收入的多元化、投资的多元化从根本上奠定了居民消费行为多元化的基础。

然而，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同样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如果各种有利条件发生逆转，各种积极作用的反面同样以相同倍数或更大的比例带来消极的影响。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一旦经济在某个点发生逆转，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得居民金融资产、居民收入、居民可支配资产等等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影响。金融危机便是这一现象的极端体现。尽管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过快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不同时期的金融政策相继出台，反映了在应对经济波动时的不够成熟，也直接体现了我国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基础的不牢固。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国居民在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同样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的金融政策会呈现何种走势，这也导致了我国居民在参与金融活动时一定的盲目性。

2.4 对外贸易与消费

2.4.1 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转变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全面展开，自此，我国对外贸易开始快速发展。从过去简单的资料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开始转向规范化的国际贸易，通过国际分工、根据比较成本优势，我国开始了对对外贸易强劲发展时期。我国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进口各种生产资料、技术等等，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图 2-1 和 2-2 中可以看出，在此时期，我国出口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都处于较低水平，并且在此期间，各种产品的比例变动幅度不是很大。我国出口的商品按其金额排名的状况也是逐年变化，本研究选取了若干年份的排名情况如下²³：

1986 年我国出口的前十名的商品分别是织物服装、原油、棉布、成品油、玉米、原棉、涤棉布、棉纱、煤、真丝绸缎；到 1989 年这一排名变为织物服装、原油、棉布、成品油、真丝绸缎、涤棉布、煤、厂丝、蔬、玩具；而到 1992 年这一排名又变为服装、原油、棉布、电讯设备、家用电器、棉针织品、玉米、抽纱、钢材、涤棉布；1994 年的排名为服装、家用电器、电讯设备、玩具、棉布、棉针织品、原油、毛针织品、体育用品、棉织品。由这几个年份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在 1986 年到 1992 年的六年期间，我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变动幅度并不是很大的。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排序表明，我国在此期间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通过我国相对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各种初级产品或资源的组合，来拉动了我国对外贸易中出口的增长，处于对外贸易的初级阶段。

²图 2-1 相关数据详见附表六：我国 1980—2009 年进出口商品总额
³图 2-2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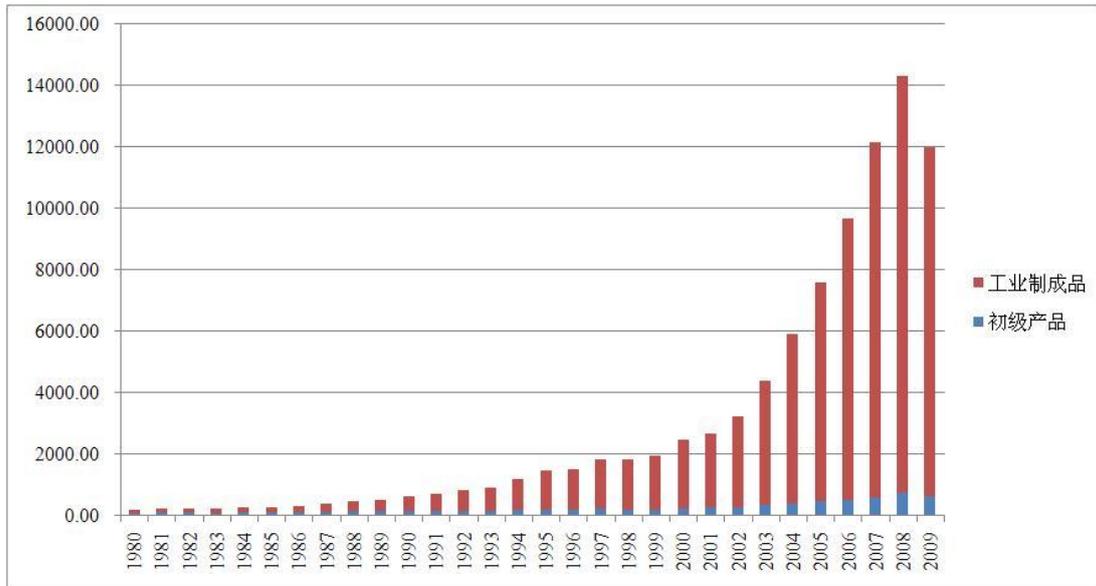


图 2—1 1980—2009 年我国出口结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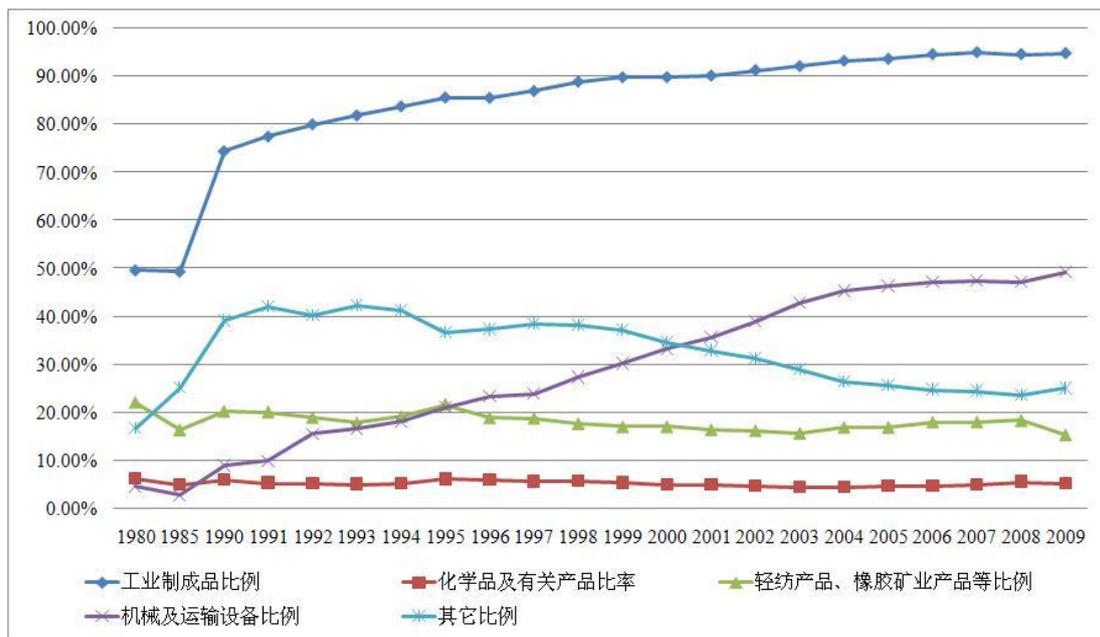


图 2—2 1980—2009 年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构成

我国贸易结构的第二次转变从 1995 年开始，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发展为标志，我国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的出口在所有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并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则稳步持续上升，并逐渐在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由图 2—1 可以看出，我国出口贸易额急剧上升，尽管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都有所增长，但是工业制成品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初级产品的增长速度。从图 2-2 中也可以看出，我国出口的工业制

成品的比例，自 1985 年之后急剧上升，在 1990 年之后一直处于高位缓慢增长状态中，在 1995 年之后，这一比例始终处于高于 85% 的水平之上。在图 2-2 工业制成品内部各种产品种类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比例在 1995 年之后所占比例迅速提高，并且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类别，并且不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轻纺产品、橡胶和矿业产品等和其他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贸易额比重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贸易已经进入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4.2 我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

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一个国家可以运用的经济资源有了更多的来源，这一变化使得资源整合与利用变得日益国际化，同时，商品的生产 and 消费等也都逐渐的国际化。市场各主体也日益丰富化、多样化，外国的消费者、投资者、跨国企业、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等，都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以来所取得的直接经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处于持续旺盛阶段，我国逐步成为吸纳全球产业的中心地带。各国向我国出口的商品逐渐向机械运输设备倾斜，开始在我国投资建厂。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的出口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他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轻纺产品、橡胶和矿业产品等的出口量逐年降低。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把国内成熟的产业向我国转移，如 IT、汽车、机械、化工等。这些产业大多投资在我国沿海地区，也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我国进口商品的结构，恰恰符合了国际间产业转移和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我国进口的商品结构随之也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如图 2—3 和图 2—4 所示⁴⁵。

同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类似，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即，进口的商品结构存在一个时间点，在此时间点之前和之后的进口商品数量和产品比例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仍然是以 1994 年为分水岭，1994 年之前，以金额计算的我国进口产品数量一直处于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并没有大幅度的变动；1995 年及以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进口产品金额实现了跨越式的

⁴图 2-3 相关数据详见附表六：我国 1980—2009 年进出口商品总额
⁵图 2-4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 2010》

发展,进口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都有较快的发展。但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我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大体呈现出降低的趋势。如图 2-3 所示。这表明了我国国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略有上升,说明我国国内的技术和资本有所提高,开始发展起具有自己技术的产业来,我国国内产业的发展进入较快的高端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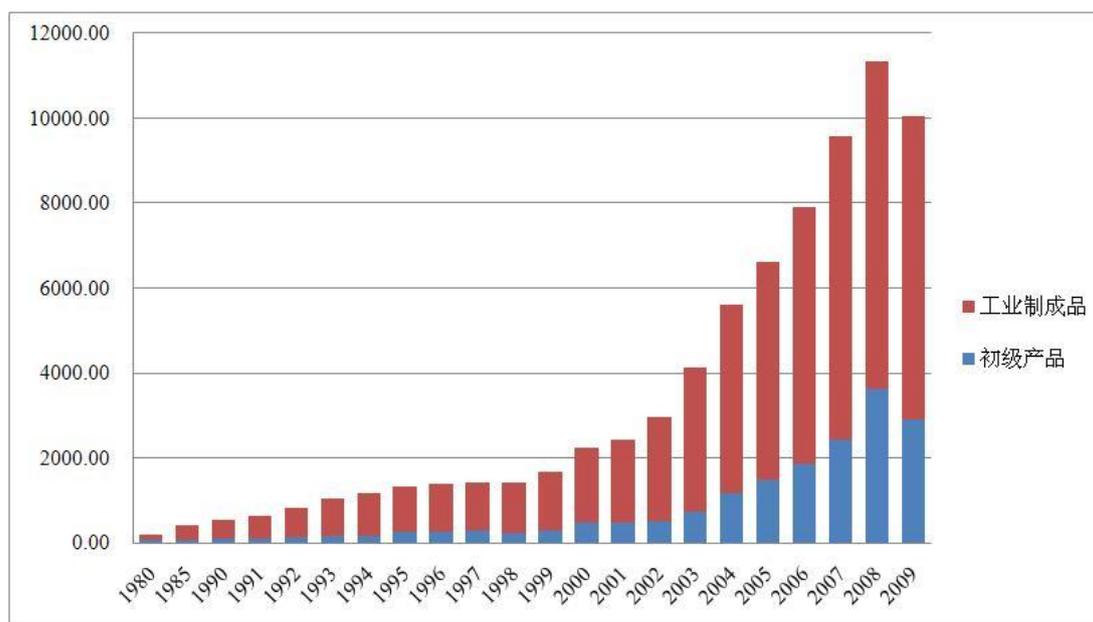


图 2—3 1980—2009 年我国进口结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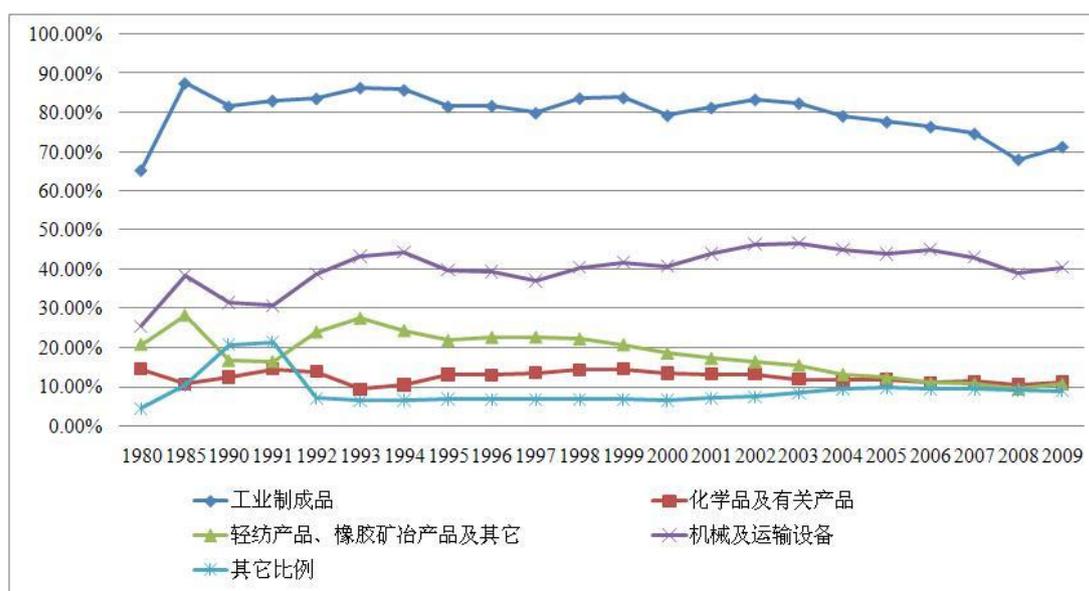


图 2—4 1980—2009 年我国进口工业制成品构成

2.5 供给结构

同需求相对应的范畴是供给。需求和供给是相互对应、相互匹配的，有什么样的有效需求就要求有什么样的供给相对应，同样，有什么样的供给就基本会产生什么样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求和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两者既对对方产生直接的决定和影响作用，同时也会受制于对方的决定和影响。

2.5.1 产业供给同消费需求间的变动关系

从产业供给的角度分析同需求的关系。均衡的市场上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是相平衡的，此时存在一个均衡价格，这个均衡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对该消费品消费的一个心理预期与接受程度，因此，产品的价格可以看做是需求大小的一个测度标准。

产业供给作为社会生产后的体现，决定了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同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是一致的。二者相互联系，互为前提，产业结构决定了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结构，从而决定了消费者消费时产品的构成，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化，消费商品的结构就没有了物质基础，因此，产品结构是消费结构的基础；消费结构对产业供给结构的决定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消费需求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形态，是产业生产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厂商生产的指引和动力，没有消费的生产是无效率的生产，是没有市场的，因此，产业供给必须同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相适应。

2.5.2 我国目前三大产业供给结构

为直观的研究我国三大产业的结构布局，本研究对我国 1981 年到 2009 年二十九年的三次产业的数据进行整理，分别对三大产业绝对值的变动趋势和各自百分比的构成情况进行了分析，最终结果如图 2—6 和图 2—7 所示⁶⁷。

⁶图 2-6 相关数据详见附表十：我国 1981—2009 年三次产业产值及人均产值

⁷图 2-7 相关数据详见附表九：我国 1990—2009 年三次产业对 GDP 贡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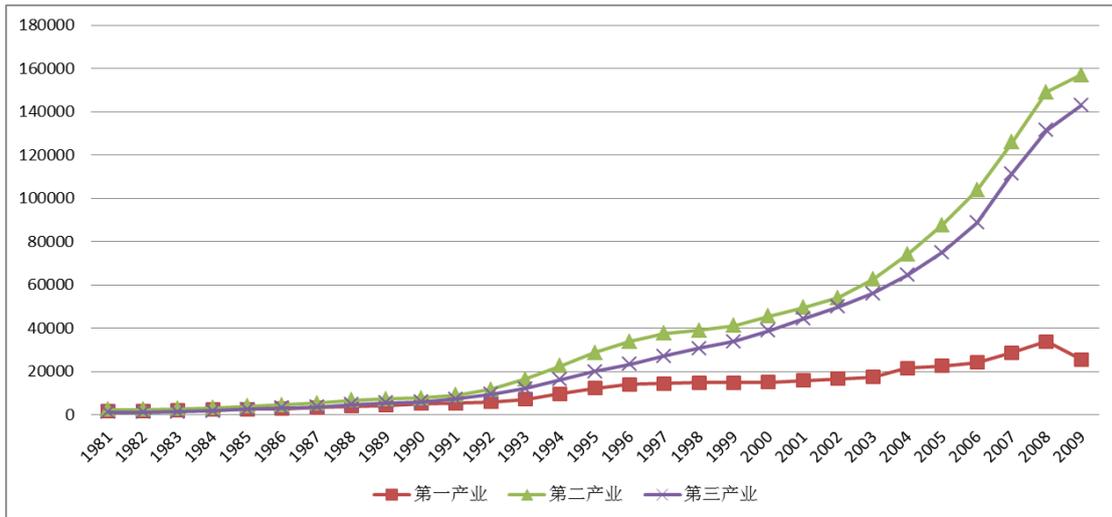


图 2—5 我国三大产业产值绝对值变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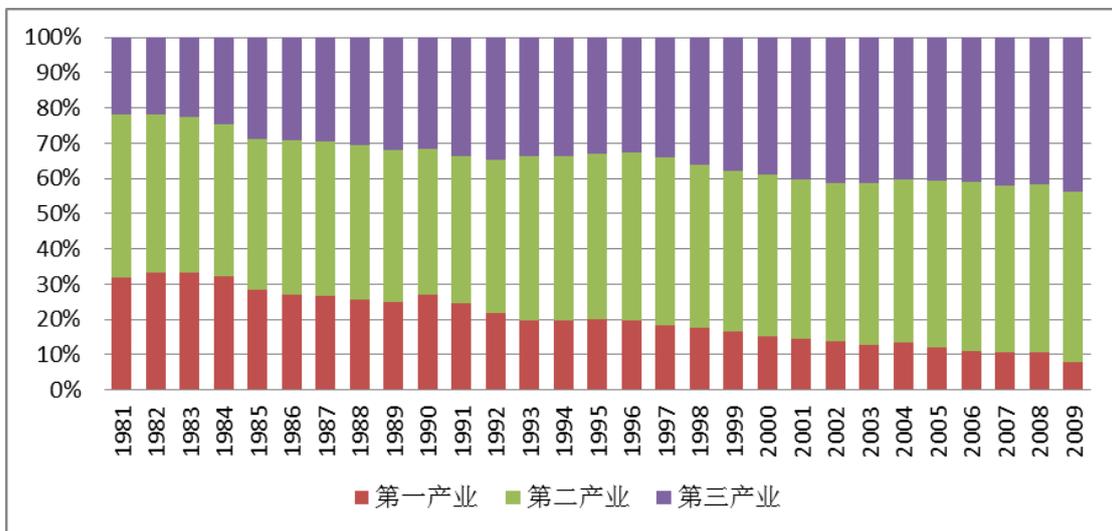


图 2—6 我国三大产业产值比例变动图

由图 2—6 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产业产值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第三产业，而作为基础产业的第一产业农业则增长速度最慢。而且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1981 年到 2009 年的二十九年间这一产业增长的趋势可以分为较明显的三个阶段：一是 1981 年到 1991 年的十年间，三大产业都处于低速发展时期，尽管都有所增长，但增速是相当缓慢的；第二个时期是 1991 年到 2002 年的十一年期间，三大产业的增速都有所提高，并且三大产业之间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距；第三阶段是 2002 年到 2009 年的飞速发展时期，尤其是 2003 年之后，第二产业同第三产业的发展迅速加快，相比之下，第一产业仍处在较低位的缓慢发展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三大产业供给结构是不均

衡的，其贡献率从大到小分别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

另外，从图 2—7 我国三大产业产值比例变动图可以更直观的看出来，我国第一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例逐年降低，而第三产业的比例逐年上升，与此同时，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除个别年份有所降低之外，也基本处于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增加的比例远远小于第三产业增加的比例。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三大产业的供给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值增加的比例小于第三产业产值增加的比例，但是其绝对值仍然处于绝对的优势；第一产业作为基础产业，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但产值却是逐年稳步上升的；第三产业作为我国优先发展的产业，增长速度是极快的，尽管其绝对值要小于第二产业的产值。据此可以看出，我国产业供给结构正在处于优化发展阶段。

三、影响内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基础

3.1 内需结构性因素间的关联

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金融制度和对外贸易制度共同构成了影响居民消费的内部结构性因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一制度安排，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在消费这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内部，尽管各个因素都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每个因素发生作用又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对彼此作用强度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收入分配体制，是居民消费行为的第一道强有力的支撑。正是存在着这一收入分配制度，居民个人才有了消费的基础和动因。收入分配强度如何、结构如何，从根本上决定了居民有效需求的强度。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最基本的保护网，属于收入再分配制度，是收入基于效率原则的基础上的第一次分配，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是收入基于公平的原则的基础上的第二次分配。这一再分配有个特点，即其时间跨度概念较初次分配存在更大的计划性，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或说时间的角度，提高了居民一定时间内可持续稳定支出的保障。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显著存在的，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则构成了一国经济的产出。作为经济产出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消费，也会收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而对经济产出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金融制度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制约是比较明显的，不管利率的变化还是消费信贷的强弱，都从最为直接的基础上影响了居民在可能性消费和可能性储蓄之间的权衡，进而最终表现在居民在消费上的支出。

对外贸易则从三部门经济中，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对消费者消费行为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一是在对外贸易中居民个人收入的开源，二是在对外贸易中居民个人消费品的分流，前者是从消费者个人收入方面的影响，后者是从消费者消费品结构方面的影响。

由上部分讨论可知，这些因素对消费者内需的影响是存在相互关联的，并在各自的程度存在着一些差别。然而，作为经济体的一体性，诸多因素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独自抑或相互或者共同作用，对我国内需产生着影响。因此，

在一个大的结构性框架内对诸多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是十分科学合理的，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更全面的分析我国消费者需求的整体影响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消费内需不足的状况。

3.2 影响内需可持续性增长因素的结论

首先，在影响我国内需的诸因素中，收入分配对内需的影响是较大的（影响系数为 0.623），供给结构对内需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影响系数为 0.354）。

其次，进出口对内需水平的影响路径上的系数并不是十分显著，不具备显著性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进出口对我国内需不存在影响。在模型中，进出口同供给结构、进出口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9 和 0.19，这说明进出口同我国的供给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由此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内需水平。

再次，同样，供给结构同收入分配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98，这说明两者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结合二者同内需水平之间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对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支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诸因素中，居民个人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三大产业产值的迅速提高作用是巨大的。在模型框架内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在供给结构中，第二产业的影响系数达到了 0.894，比第三产业的 0.748 要略高，而第一产业的贡献最低，为 0.668，这说明现阶段促进我国内需快速增长的供给因素中，第二产业作用是较大的，而第一产业最小，正在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收入分配中，城镇居民的影响系数高达 0.937，而农村居民为 0.695，同城镇居民的系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对我国内需的快速持续增长作用较城镇居民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

第四，从内需水平的内部来探讨，我国内需的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影响系数达到了 0.99），而农村居民的作用较之存在很大的差距（影响系数为 0.763）。这同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相一致的，目前收入分配的城乡差距仍在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显著存在、城乡金融体系的建立差距巨大、进出口贸易对农村居民的惠及程度无法达到优化、我国产业格局的分布使得农村较之城镇始终处于产业低端化的水平，这一系列的因素都导致了我国农民消费需求对总需求拉动作用的降低。

最后，尽管各因素对我国内需的影响程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且该模型中因数据样本问题，没有纳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相关变量，但在前面章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诸多因素对我国内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显著存在的，只是这种影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恰恰为我们更合理的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证指导。

四、研究结论及内需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研究表明，在影响我国内需发展的内部微观因素中，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系和对外贸易结构四个因素，分别从居民收入状况、居民转移支付、居民金融资产的影响和对外商品与资源互通的角度对消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都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同需求相对应的范畴，供给，则从中观角度出发，通过产业和投资的结构，进而影响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量，并直接影响到居民可消费的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研究我国内需长期可持续性增长问题，则是从宏观的结构和总量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应该从内需的微观支撑和中观匹配两个角度综合进行研究，以构建内需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结构基础。

4.1 收入分配政策

4.1.1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这一观点体现出：对我国分配制度的规定：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则要更加注重公平。这要求我们需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增加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以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第二，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拓宽投融资渠道，发展、完善各类金融市场主体，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比重；第三，通过财政手段、金融手段、法律手段等诸多方式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需求。

根据我国分配制度的规定，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意味着不仅只是按劳分配形

式，还应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要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制度，要逐步探索按劳动、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的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分配方式、方法，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体原则的体现，不仅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经济建设，更可以消除收入与贡献背离的不合理现象，从而保证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实现。

4.1.2 提高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而转移支付则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可以说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城市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转移支付对促进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能使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逐渐加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在其消费需求、消费层次上得到加大的提升，从总体上提高总需求。

就农村而言，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是对农业的技术投入支持，可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从而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高质量、高效率，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并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保护农民的利益。第二，提供技术支持，引导农民调整产品结构。农业作为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财政拨款，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农民调整农产品结构，促进质优高产的农作物的种植，取代质低量少的农产品的种植，能够使农民获得更多更为直接的收益。第三，培养新型项目，积极发展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农村，第二产业的某些项目存在一定的立项困难，但仍然可以在某些行业尝试；而第三产业在农村的兴起和发展，则具备一定的优势，如农村旅游业。拓宽农村产业渠道，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可以促进农村经济活力，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

4.1.3 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

税收政策具有比较强大的杠杆作用，主要是指税收对高收入者的调节，这直

接体现在累进制的税收制度上，可以有效平滑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整体消费倾向的提高，并最终提高总需求。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应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逐步扩展到消费税、增值税、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等等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所得税的管理。

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正在逐年提高，2006 年上调为 1600 元每月，2008 年调整为 2000 元每月，2011 年又上调为 3500 元每月（9 月 1 日开始实施）。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有效的保障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同时不至于使居民高低收入差距过大。然而，累进税率制的一个前提是个人收入的高度透明，但我国目前的收入透明度并不高，这便限制了累进税率制作用的发挥。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的透明化管理将是税收杠杆作用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其他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等的征收，有利于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使得他们放弃个人资产的过度积累，从而通过消费、投资等方式将个人资产分散出去，从而可以促进总需求的扩大。

提高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立法管理，修订个人所得税法，修改某些不利于实际操作条款，使有关法律更能促进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第二，加强税收管理，强化税收代扣代缴工作的落实，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制的规定、章程，对储蓄利息税也实行按比例税率征收的办法，实行累进税制。第三，加强个人财产和金融资产的管理，提高个人收入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管理，对个人银行储蓄和金融交易实行实名制管理等。第四，采取基本一致，个别优惠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收入家庭，特别是个体业主、私营企业家把收入用于再投资，鼓励高收入家庭的健康消费，尤其是科教文卫方面的消费支出。第五，加紧税种立法和执法，尽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国际通行的税种制度。

4.1.4 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各种资源的自由配置，以达到最有效的状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主要是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使他们能够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可以很好的促进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能动优势，对提高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内需有重要的作用。这都取决于落后地区的劳动

力流到发达地区后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首先，劳动力的流动缓解了输出地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取而代之的是流出后劳动力获得的高报酬，同时也提高了输入地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资率；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平抑了输入地由于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工资率上升的压力。但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阻碍了这种流动，因此，应打破城乡和地区的壁垒的制度障碍，推进制度创新，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首先，取消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尽管现在许多城市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就业压力，但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本市居民的就业，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设置了诸多限制，各种名目繁多的证件、过多、过滥的收费项目等等，甚至某些粗暴清退进城农民工的做法，都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因此，应该在城乡兼顾、适度控制、管理得当的原则指导下，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禁止一些不合理的限制政策，取消乱收费的一些项目，特别是要杜绝简单粗暴的清退做法，促进劳动者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高效配置。其次，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加快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只有消除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此带来的就业不平等问题，才能加快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促进城乡经济的一体化，缩小收入差距，扩大总需求。

4.1.5 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同城镇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措施。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最重要的标志是农村居民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仅仅是劳动者在空间上的转移，并不能说农村劳动者进入城镇工作，在某些生活方式上城镇化就意味着城镇化的完成。因此，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提高进城农村劳动力在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的条件，使得能够逐步提高和改善，提升他们自身劳动力素质、经济条件和收入水平方面的水平；另一方面，加快农村教育、科技投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使农民真正享有城镇居民享有的各种便利，消除城乡之间的各种显著差异，加快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促进整体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2 社会保障政策

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各项改革措施都已相继推出，但是还亟待进一步完善。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这是导致居民消费谨慎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是解决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问题，以免除其后顾之忧，尽管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但也有利于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扩大社保资金的来源、增强社保制度的抗风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进一步发展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计划，在社保的改革过程中应坚持城乡互动，待遇平等和保障对接的原则，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的兴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伤残保险等，尽快出台改革的明确方案，最终突破二元社会结构的束缚，建立起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具体来说，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就是要建立起适度、公平、有效的三维结构的社会保障体系。

所谓三维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四个层次和四个支柱：四个方面，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和意外事故保险；四个层次，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四个支柱，即政府、社会、单位和个人。只有上述诸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真正建设成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应着力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做好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工作，建立多渠道的、完善的对低收入者的救助制度，妥善解决城市特殊困难家庭的各方面问题，将尽可能多的城镇贫困人口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第二，根据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适当增加社会保障各项费用的投入。第三，保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人员工资、养老金和离退休金逐月足额按时发放。第四，要继续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及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合理确定城市“低保”标准和保障对象，合理确定各类人员的补助水平，切实做到应保尽保。最后，应加快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建设，提高商业保险对居民生活的保障作用，提高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水平，做到农村和城镇待遇有区别但相对项目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所面临的紧迫的任务。应建立与城镇社会救助制度相平等的救助制度，而不是有所区别的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问题的根本；根据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客观需要，应该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最迫切的是要完善和扩大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农村社会保险同城镇之间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具体说来，农村养老保险宜采取强制储蓄积累的模式，医疗保险制度，可实行大病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办法，国家、乡村集体和个人共同为个人账户缴纳费用，积累的基金属于账户所有人个人所有。鉴于农村贫困人口看病难的问题比较严重，可以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资金由政府财政和社会力量共同承担。

4.3 金融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提高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全民储蓄率的提高，社会储蓄率的提高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投资。因此，经济政策的有效运用，必然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市场缺陷，必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运用各项政策，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抑制居民收入的过快增长，实现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合理变动，改善居民单一的金融资产结构，改善社会投资资金的配置等等，将会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

第一、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金融机构存放款水平。

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会对社会上的金融资产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这一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通过调节金融机构存放款水平来实现的。金融机构存放款量的改变，可以有效改善流动性约束，比如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预期收益率便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规范化的直接融资形式。

深化金融体系的改革，发展规范化的直接融资形式，对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首先，可以向居民提供各种不同的金融工具，以满足不同需要；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直接融资提高居民的储蓄倾向；不同种类消费品的出现可刺激消费，不同组合的金融投资品可刺激储蓄等等。其次，居民大量的储蓄存款集中起来转化为更长期的金融资产，非银行金融

机构可以为投资提供更稳定的资金来源。这种形式一方面会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再次，由于投资领域的专业化，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要比商业银行更能有针对性的为企业筹配资金，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资金配置，从而促进资金配置的有效性，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第四，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销售及承保方面对地方经济体能够做出更大的承诺，中央及地方政府会发现非银行金融组织向公众出售政府债券将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从而可以避免货币的直接融资；最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兼并和收购业务中具备较突出的优势，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会对经济的稳定性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第三、优化信贷结构，提高信贷体系对内需的支持作用。

市场经济的失灵，无法通过自己的调整实现优化，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便成为了一种必然。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必须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的提高。通过创造条件，促进投资信贷的发放是一个很好的途径。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其出发点也是使得自己组织的理论最大化。在市场无利可图时，他们对信贷的发放将不会再足额、及时。因此，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要通过政策的指导，提高投资者的投资预期收益率，或降低贷款利率，使得投资预期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从而可以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促进放贷。其次，政府可以降低企业设立的门槛，降低新建企业的审批费用，对新增投资给予一定比例和一定年限的税收减免等，从而促进社会投资的提高。再次，为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政府还应改善消费信贷发展的外部环境，如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通过以上种种措施，逐渐优化信贷结构，从而促进信贷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第四、规范个人信用制度，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通过调整现期的收入政策，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调整当前我国的消费政策，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完善创新消费信贷工具，降低金融市场上的各种风险，完善消费信贷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些都需要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通过提高个人消费信贷的环境，增加居民个人的消费信心。

4.4 对外贸易政策

4.4.1 大力改善对内贸易

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必须重视改善和调整国内外的需求结构。改善和调整国内外需求结构最重要的是促进内需，倡导国内产品消费需求，鼓励居民提高对民族产品的消费，因此为抑制国内经济的过度波动，增加居民对民族品牌的消费，减少国外产品的需求，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畅通流通渠道以最大限度促进消费

搞活流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促进消费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种政策的制定要以以下原则为重要导向：一要健全农村流通网络，增强农村信息流通和物流事业的发展；二要进一步扩大品种，加大如“家电下乡”等活动的推广力度，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同城镇的协调；三要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提高城市居民服务的便利程度；四要促进城市耐用消费品的升级换代，改善消费的种类和数量；五要促进流通企业的发展，降低单位商品的成本；六要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大力促进节假日和会展消费等消费方式和模式，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加大国内产品的区际贸易自由化程度

区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也逐步增强。这种力图扶持本地产业的政策，反而在更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和区域市场一体化滞后严重的局面。这种局面削弱了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反而给国外产品的趁虚而入带来了大好时机，进而大举占领了国内市场。在某些国外产品的确比国内同类产品质优的前期下，再加上当地消费政策的引导，国内居民易于形成较歪曲的消费观念和方式，觉得国外品牌质量上比国内同类产品更胜一筹，更易于购买和消费，如此，部分国外产品的进入取代了部分国内产品的需求，这种取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有其存在的各种限制，给我国国内区域之间设置了一系列的贸易壁垒，而国外资本和商品便利用这种壁垒，占据了我国很多产品市场，从而使我国的产品需求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此，同世界经济融合的同时，我国的国际贸易逐步深化和自由化，在这一进程中，必须重视清除国内区域间的贸易阻碍，

使居民消费品结构在国内外消费比例上逐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也必定会扩大国内产品的市场需求。

第三、采取积极的收入分配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

辞去积极地收入分配调整政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可以有效调节国内市场上劳动者群体的收入平衡，从而有利于调节低收入地区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

缩小我国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切实增强低收入阶层的保障措施，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比如在农村建立农产品的价格保障制度，取消各种税费的征收，增加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在城镇，健全各类下岗职工的保障措施，促进信息的及时快速公布，多方面进行就业培训和指导，多渠道解决再就业问题等等。只有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从而最终促进国内需求的持久旺盛和国内外产品需求的平衡。

4.4.2 积极应对外贸易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促进国内消费需求，改善人民消费结构，不应拘泥于传统的贸易理论，而应在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及国际市场经济法律环境，恰当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促进全国贸易自由化、竞争化的同时，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积极应对对外贸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寻求新的资源和市场，提高进口替代部门的技术水平。对于部分产品，国内生产的成本和质量同国外同类产品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多方面，最主要的如技术和资源。而相同的商品在不同的市场上所面临的消费群体也存在着不同，因此，寻找新的市场，对产品需求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合理调整进出口产品和服务。在进口产品的需求上，应该以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为主导，分清轻重和主次，主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关键性产品和部分产品的元器件与能源材料等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进口。这些产品的进口会有效改进国内产品的质量水平，对提高国内产品需求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通过制定各项政策和措施，可以有效促进国外投资投向高

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通过大力发展各种产品及服务的外包业务，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促进消费品的产品升级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积极促进贸易的便利化。积极应对对外贸易还应处理好对外贸易中各方面的关系，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坦然面对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各种摩擦，并积极予以解决，严肃处理出口品的质量问题 and 安全隐患，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促进国内企业对国外新兴市场的开发和利用。

4.5 产业政策与投资政策

在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三大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是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增长的最有效的方式。以制造业为中心和基础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技术的提高，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就业和经济的增长，并最终会影响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的消费需求的提高。因此，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的作用是巨大的。为此需要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发展适合我国的特点，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在结构调整上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意味着继续采取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应加快向集约型的经营方式转变，促进劳动者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高，增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和综合竞争能力。

第二、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产业布局。与我国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一大主要特点。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这一二元分制的特点，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重阻碍。因此，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积极制定适合城乡特色的产业结构政策，促进产业链的完整和顺畅，巩固城镇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同时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另外，在一些适合发展第二产业的农村地区，制定各项政策，大力吸引投资，促进城乡产业格局的合理化和高效化。在城乡结合地区，加大城镇对农业的帮扶带动作用，引导城镇工业和服务业对农村相关产业的示范作用，做到城乡相互协调发展，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化。

第三、加强西部地区吸引投资的政策支持

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资源匮乏，交通运输不便，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合理，现有资源闲置、浪费较为严重。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应进一步继续积极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的发展，以缩小东西差距。缩小和控制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是要大力发展、加速提高中西部的经济实力，唯有如此，才能控制和缩小省际居民收入差距。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帮助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制定各项优惠让利政策，提高西部地区吸引投资的力度，设法将各种经济活动吸引到这些地区去，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吸引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和技术参与内地开发。另外，通过财政资金的支持，配合一定的政策优惠，大量吸引海内外资金，逐步培养成西部发展的良好格局，促进西部居民生活水平较快地提高，这些举措对缩小东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从而全面提高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